

## 中国及其中产阶级如何应对人口老化和精神健康的问题？

凯博文 (Arthur Kleinman)

至2040年，亚洲将面临不寻常的形势：各国将出现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新人口结构。日本将成为首个60岁或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的40%的国家。中国不会落后太多，将达到25%，并且将会快速提高。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每一位退休人员有超过七位就业人口提供财务支援，然而至2040年，相应的数字将降到不足两位，引发社会福利体制的危机。此外，同美国一样，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将会（目前也差不多）在生活中受到抑郁、焦虑、药物成瘾、痴呆或其他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为应对上述问题，中国目前正在（并将持续）制定全新的社会政策与医疗计划。此类措施不仅具有社会意义，而且在经济和政治上也关系重大。对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理解他们本身及其所处的世界背景，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全球性问题——老龄化与精神健康——将起到重大而关键的作用。

我们首先看看中国面临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的背景和应对办法，以及把这些议题放到中国研究中的更核心位置时，该国呈现怎样的面貌。随着中国社会变得更富裕、城市化和全球化，很多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新兴中产阶级的形成是真正具革命性的进步之一，带来了最深刻的影响，却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个群体的人数大约在2-3.5亿之间，包含商人、专业人

士、技术员、高素质工人以及其他有良好教育和阅历的人。他们引领着全国在各个领域，包括食品和药品、职业活动和商业道德规范等，追求更高标准和更好品质生活的进步。不出所料，在面对有关人口老化与精神健康问题，这一倾向也会有显著的影响。

首先，人口老化与长期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偏高有关，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与抑郁症等。此类疾病会造成疼痛、失能与死亡，是医疗体制和居民家庭的主要负担之一。年龄层较高的老人使用医疗服务的比率会明显提高，消耗他们及其家人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此外，中产阶级的老人非常关心自己获得的医疗服务的质量。凭着自己普遍的经验，他们批评医疗服务质素恶劣，医生只想着赚钱而非以减轻病人苦痛为依归，加剧了社会对医生的不信任，在当今中国甚至达到危机的程度。这种不信任的态度迫使政府改善医疗保险及医疗体制。

数亿中产阶级中国人面临的老年医疗难题在于：当夫妻二人都有工作，家庭医疗护理人员缺乏训练、供应短缺，以及生活辅助设施与护老院数量有限、质量存疑的时候，如何为年迈与失能的父母提供高质素的看护服务？对于老人患有认知障碍症的情况，问题会变得更加尖锐和困难，因为直到今天中国才开始兴建高品质的认知障碍症护理机构。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指出人们要在家奉养老人，故为老年人提供院舍式护理遇到的伦理和情感问题也变得更加棘手。经常有评论家指出，养老是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面临的一场考验。

中国的社会福利机构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来自长者护理这一难题上，要在家庭与机构之间取舍。解决该难题不仅需要增加养老的技术和财务资源，还涉及对什么是当今中国的生活的道德和政治考虑。怎样的长者护理体制是能被接受的？高品质护理包含哪些要素？退休与社会福利体制应该如何改进？有尊严的死亡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听到对类似关切的共鸣，但中国的国情增添了此类全球性议题的独特之处，

使西方社会的应对策略受到局限、似乎不太合时宜。中国将如何制定应对政策和计划，不仅会改变中国社会，也可能为全球带来影响。

与人口老化和长者护理的挑战相似，精神健康问题也为了了解中国社会打开一扇窗，并提供了观察其问题及前途的特殊视角。当我于1978年首次访华时，中国卫生部长机械地重复着共产党鼓吹式且完全荒唐的论述，介绍道中国没有精神病人，因为共产主义文化不具有资本主义这精神健康问题的根源。在1980年，当我开始在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实地考察时，只有不到1%的患者被确诊有抑郁症。我开展的研究有助改变原有的错误认识，表明许多被确诊为已经过时的神经衰弱症（当时的主要诊断结论之一）的病人应该被重新诊断为抑郁症，并且可以通过使用普通的心理疗法和化学药物得到有效的治疗。2001-2005年开展的一项跨越四省的调查发现，抑郁症与其他常见精神健康问题在中国的发病率与美国维持在同一水平。中国对儿童的自闭症、青少年的饮食失调与药物成瘾、糖尿病人和癌症病人的抑郁症，以及老年人的认知障碍症均存在广泛的担忧。这与美国或欧洲的情况大同小异。中国的精神病诊疗已进入现代化，令以前被视为“西式”的治疗方案如今成为国际通用做法，并且有愈来愈多中国患者使用。

与精神错乱（精神分裂症与躁郁症等）相关的污名仍然是重要的人权议题，造成歧视、虐待和沉重的家庭负担。随着公众意识提高（特别是在主要是中产阶级人士的大城市），对精神健康服务更早的利用，以及对心理治疗和自助的关注开始出现，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情况在快速改善。到中国的书店看看便可以发现，现今的读者能够更开明地了解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知识，以及中国向中产阶级社会转型时在情感、道德和社会等方面带来的影响。

我在其他地方曾提到，每个中国人都正在探寻一系列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包括对幸福、正义、性别平等、性认同、宗教

和精神价值观，以及新型主观性的内心探索。作为21世纪的个人，我们在每个领域当中都看到既有传统方式的复兴，又有对更全球化生活方式持开放态度。学者指出，在文化和政策长久以来受集体主义倾向主导的社会，这种进步主义个性化发展代表着重大的世代变革，体现在各种主流社会思潮中，从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到艺术和社交媒体里的文化与技术创新等。

这些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探寻蕴含更深远及潜在革命性的影响。我们应开始注意到中国人的自我认识不只是更具有个性，而且，尤其是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间，看到他们与全球有着更密切联系的不同人格特征。这种自我认识较少陷入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对不同文化观念和社会关系的连接则流畅得多。它还具有高度的实用性，有更多的分层，而非分隔，或者说，在处理愿望和责任的界限、权威的上下层级关系、爱情和友情的水平关系、选择与义务、过去导向与未来导向等各种问题时，伴随的烦恼较少，且更为简单。因此，在这些选项之间存在灵活的转换，而焦虑并不包含在选项之中。转换本身已成为新的现实。

中国人的这种自我认识在未来将成为中产阶级的主流自身定位，并且成为商业与专业服务领域，以及政界的未来领袖的常态自我认识。某些社会学家提出如下颇具吸引力但肤浅的观念，认为个性的广泛变化反映着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格局的要求和机遇。然而，这种全球化研究视角还需要结合对中国的深入理解，就是变化中的中国道德和情感环境如何产生一种独特的主观性，其中的传统特征并未被充分取代，而是与各种新的导向混合起来。结果形成中国今天的作家与电影制作者所关注的那种矛盾和讽刺，同时也大量表现在当代艺术家广泛采用的“分层”技巧中。后者既反映着多样化、非单一导向的各种文化表达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包含其并存的可能性。这种多样化本质上是更高的修养，更包容差异和不确定性，令无谓的忠诚更少发生或者不至于影响太严重的现实性批判立场，以及随着对新现实的开放态度而减少防御性本土主义的需要等。我们可

以看到这种个性正在年轻的中国学生身上发挥效用，他们能自如地同时保持全球化与本地身份。我同样相信它会在更有效的方面发挥作用，例如把广泛的社会不信任转化为对更高品质服务的现实需求。

当然，政治体制会建筑在这种主观性基础上，还是试图控制和约束它，依然没有明确答案。但我相信，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的这种新的道德和情感导向在未来将有更好的前途。尽管受到当前压制的政治气氛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影响，政治自由化（当然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将变得更可行。在近距离考察中国社会接近半个世纪之后，我所看到的不止是人口老化与精神健康方面浮现的危机，还包括这些观点如何丰富我们的认识：中国人正在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什么问题，以及最重要的一点，一般中国人在道德与情感方面的主观认识如何重塑文化、社会关系及日常生活。

以医疗政策的变化为例，中国政府已采取行动，扩大保险保障范围至灾难性健康事件，以及为严重的慢性病建设治疗体系，以减轻居民沉重的财务负担——这种负担在农村地区经常导致破产甚至自杀。基于同样的考虑，现在的医疗政策与计划是围绕新兴的基层医疗选项来组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这是一种全新的专业医疗服务模式。就算是1960—1970年代的赤脚医生也不是真正的基层医疗医生，尽管他们相当重要，却只是非常低水平的公共医疗和急救人员。新的医疗模式能够更贴合病人对于更高品质的医疗的需求，也是对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很恰当的应对措施（尽管实现起来或许不易）。它意味着病人不再需要争相排长队去医院找专家为自己做几分钟诊断。从原则上说，病人可以通过检查和转介，获得综合全面的医疗服务——如果说有中产阶级的解决方案的话，那便是如此。目前还有证据表明，政府在其他领域也对中产阶级作出类似的政策响应，包括食品与药品监管、禁烟、环境健康标准，以及对医生和护士的工作标准要求等。所有这些例子都是上述的发展进程在政治治理层次上带来的影响。即使只是

在初步阶段，所有形势也都令人鼓舞。

当然，中国的整体情形依然复杂。我之所以强调积极变化，是因为美国和欧洲的评价家都倾向以过度批评和意识形态上负面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社会。相比之下，医疗领域长期以来提供略显不同和普遍更正面的角度。这几十年间前所未有的贫困减少和财富创造与中国人寿命的大幅延长、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现代化医疗服务与公共医疗体制的建设息息相关。

如今，随着中国需要改善养老服务，若干力量在发挥作用，将决定罹患认知障碍症的病人及其家人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商人正在建设退休和生活辅助设施以及护老院等机构。随着中国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产业经济转型，这些机构能否为公众健康作出重大贡献，还是成为获取财富的新方式，仍有待观察。的确，养老与医疗领域将提供无可比拟的机遇，在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中，以及在试图满足民众需求和愿望的中国商人、官员与专业人士的实际行动中，展示新型服务经济的面貌。专业人员正在利用技术和装备来提升更高端的医疗项目，为有复杂和共病的健康状况的老年人提供服务。科学家正在利用干细胞技术开发替换衰竭器官和老化身体部分的新方法。试管婴儿技术正在蓬勃发展。生物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变得极富开创精神，以致于富有的亚洲人、中东人、欧洲人和美国人掀起一股来中国医疗旅游的热潮。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首次把精神健康问题当作一项重大公共健康议题来对待：提高意识、普及筛查、提高职业标准，以及与领先的国际组织分享昔日作为国家机密的信息。这些措施与其他许多相关进展的结果目前尚不确定，但很明显，此类事务在中国已经变得与在美国一样同样重要。

不过，中国的政策、监管、机构和通行做法依然是中国文化与全球文化的混合产物。因此，熟悉本地和传统情况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专家，目前与全球医疗专家和生物学家，以及在环球贸易、全球环境与国际关系等领域进行全球研究的人员同样不可或缺。总之，这是个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新世界，而且它也不会远去。